

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线上的加油站——骡马店

□ 董勇

陕甘地区在历史上就有骡马店。1941年以后,随着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骡马店也大规模的建立和发展起来,成为边区交通运输线上的加油站,对边区经济的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边区一共只有十几辆汽车,且由于缺乏配件,能够开动的就更少了,还不能真正用于商业运输。边区马车的数量也极为有限,最多时也不超过200辆。因此,边区交通运输主要是用牲口驮,牲口重载一天只能走五、六十里路,往返需要较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沿途设立骡马店以解决人畜食宿问题,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和边区商业的繁荣,运输事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个时期,边区各交通要道上已经有了骡马店,但为数不多,而且基本上是私人开设的夫妻店。公家的只有三五九旅、保安处、光华商店和南区合作社等少数单位为了解决自身运输队的食宿困难,在沿途设立了若干个骡马店。

1941年5月,边区政府加大了对食盐运销工作的领导,号召全年运销食盐60万驮,并且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中共西北局提出“凡边区人民有能够运输的牲口,每年应尽运销食盐20天的义务”,并明确要求党政机关也要组织力量驮盐,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参与。边区政府还号召人民出力役,代政府运输一定数量的公益,由政府适当补给工钱。后来为了方便民众,规定交实(每驮交105斤,余45斤归私人抵运费)、交钱(公益代金)均可。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不少地方,民众自发组织协调从各家抽出

牲口和部分劳力,进行变工运盐。

为了完成运盐任务和满足军需运输,边区政府拨出专款25万元(边币,下同)发展运输业。同时动员公、私力量,投资50多万元对边区道路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到1941年底,修筑大车道967公里,其中规模较大的运盐干道定庆公路全长330公里,使全边区的简易公路达到了1851公里。

1942年2月,边区《发展私人运输企业投资办法》公布,进一步开放运输市场,并向私人运输企业提供贷款,从而使边区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当年仅陇东分区组织的专业运输合作社就有34家。随着盐运的扩展和贸易需要,骡马店作为运输业的重要保障条件也备受重视。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指出:“没有骡马店,我们的食盐统销任务就无法完成,我们的财政经济困难就很难解决。”

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对外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在运盐的主干道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牲畜、人流,使得各种形式经营的骡马店迅速发展起来。边区的骡马店有国营、私营、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股经营四种性质。在公营中又有边区物资局系统经营和部队、机关、学校经营两种形式。前者属于“大公”,后者称做“小公”,“小公”是为解决本单位的经费自给而开办的。一些公营店不仅提供食宿,还帮助推销食盐、采购布匹等。在私营中有的常年开设,有的是按季节开设,有的是半农半商性质。

物资局系统开办的骡马店,总数不下100处,分布定延路、甘泉到保安、延安到鄜县、延安到绥德、延安到临镇、瓦窑堡到绥德、定边到庆阳等各条交通干线上。此外,光华盐业公司在庆阳、曲子、西华池、驿马关、柳林、张家畔、靖边、张村驿、延水关、凉水岩等地的分、支公司也都兼营骡马店业务。三五九旅开设的骡马店也有30多

处,分布在延安到米脂、张家畔到石岔、张家畔到延安、定边到延安、延安到鄜县、延安到临镇等各条交通干线上。

私人开设的骡马店也不少。1943年下半年,定边到延安沿途共有骡马店170家,其中公营和公私合股经营的各为19家,其余都是私人开设的。靖边到延安沿途共有69个村落,其中45个村庄就有骡马店103家。这103家骡马店中私人开设86家,公家开设15家,公私合股开设2家。各地的骡马店设备条件不完全一样。公营的规模比较大、设备较好,私营的规模比较小、设备也要差一些。较大的店每晚可容纳牲口40多头,小一些的容纳20多头,也有只能容纳几头牲口的小店。在骡马店较多的市镇都成立“店房委员会”,议定草料和伙食的价格,不准店家私自抬价。

骡马店主要有两项业务:一是接待南来北往的脚户和商人,为他们安排食宿。客商进店,人有暖屋、热饭热菜,牲口有槽、草料齐全。客人用餐的办法一般是吃“包饭”,即规定一餐或一天多少钱,也可以随吃随买,吃多少买多少,都是以方便顾客为宗旨;牲口用的草料是按斤、斗计算,用多少算多少。二是为客商代理买卖货物,从中赚取三分佣金(卖方二分,买方一分)。代理买卖的货物大部分是北面脚户运来的食盐、冰碱以及边区的其它特产和南面脚户运来的棉花、布匹、日用杂货以及边区需要的其它物资。除这两项业务外,有时也经营对外出口的业务。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带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骡马店也相应地减少了。解放战争爆发后,在战争的环境下绝大多数骡马店都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但作为发展边区经济必不可少的骡马店却促进了边区一些商业集市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启动了边区内的市场,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中叶陇右著名诗人吴镇(1721—1797),字信辰,成年后自号松花道人、松屋居士,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生于甘肃狄道州(临洮县)城北郊菊巷。其先祖吴君爱于明朝万历九年由会宁迁居狄道生活,诗书传家,属书香门第。幼年时父亲吴乘元病故,由母亲魏太恭人“口授经义,并延师课读”,聪慧好学,12岁既解声律,17岁补临洮府学弟子员,20岁由康生充拔贡,熟悉地方寺庙神宇,心知劝善惩恶。后负笈兰山书院,师从牛运震、盛仲圭就学,与陇右、河西学子切磋学问,探讨经史,学习诗词,“古学”成绩优秀,先后得到甘肃巡抚陈宏谋、尹继善以及沈青崖副使的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年)乡试中举,40岁前后数次东行赴京城参加礼部试而未及第,但交接缙绅诗文之士,如京官吴绍诗、吴垣、吴坛父子,山西襄陵诗人杨山夫、三原刘绍效等,探讨诗艺,少数作品存留下来。

吴镇是一位以学问为根基,以文学为志业的陇上诗人,在清代乾隆后期走出西部,影响及于华北、江南。他经历曲折而行吟一生,作品经删存刊印成集者保留于《松花庵全集》,其中四卷诗词作品约有七百首(含组诗,词约有五十余阙),古风杂言体占少部分,而以近体诗居多;集句诗四卷以律诗居多,加上古体、绝句约有五百余首(篇),《四书六韵》二十首与《韵史》短诗约三百八十余首;《声调谱》《八病说》是探讨诗歌声律(格律)的理论文字,两卷古文(散文)七十余篇。这些作品约有二十三万字,不含《全集》未收的诗话、对联等文字。

吴镇诗歌的整体内容涵盖个人生活、风土人情与社会现象等,主题有儒家所讲五伦八德、三纲五常等经世致用之内含,亦有佛道、修仙之思想。像《近有二首》《悼亡妇史孺人》《舟覆示家人四首》等触及人生祸福无常之理。他心存百姓,像《老卒》《老仆》《老农》等诗,把受苦人的生活乐观化,四言诗《佃农》曰:“佃农输粟,每多不足;莫以我饥,而令人哭!”离任山东陵县所作四首绝句《留别陵县士民》之二曰:“斥卤田多并白贫,绿芜阡陌又逢春。三年爱汝同娇子,只怕蒲鞭也误人。”

吴镇中年任教,做官时期结交朝中大员、地方官员、诗文作者,留下许多赠答诗,颇能反映时代的生活气息与作者的精神面貌,罢官后及主讲书院时期仍乐此不疲,像《送张学师归鄜州》《赠王西和敬仪》《赠靖远胡云庵》《赠即墨杨叔平》等,诗中表达的情谊往往是交往深淡的文字记载。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五言古风体源于汉魏乐府诗,越往后代即叙事性增强,抒情性更浓。吴镇所作五言古风体《初日何杲杲》《颜铺环诗》《洗水清》等篇,以所遇所见为题材抒怀。《四女祠》《亚媛诗》以女性为题,同情其遭遇而歌颂之;《汤阴岳庙》《题哥舒翰纪功

碑》等篇以岳飞、哥舒翰为歌咏对象,可作咏史诗来读。

近体诗即绝句、律诗两种诗体经宋、元、明时代,技巧日趋精致,吴镇写有许多近体诗,实践多而妙趣深。五言绝句多含蓄深沉,如《石葡萄》:“菜石含雕镂,累累马乳稠;若教珠是玉,真可换凉州。”联章体《海喇都曲》四首绝句第四首曰:“草短青羊卧,云深白马嘶;何如风洞里,六月更凄凄。”七言绝句如《送别》:“金城春色上罗衣,绣陌风清燕子飞;一曲阳关千里恨,碧桃花下送人归。”

吴镇一生创作律诗现存近300首,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中所遇草木虫鱼,或迎来送往,或游山玩水,或宴饮喜乐,无不乘兴吟诗,以诗句记录,且讲究章法,动辄用典,如五律《怀程拳时》:“楚国才名数,程君冠钟南。清辞攀屈宋,妙语失钟谭。云梦花田落,潇湘竹雨酣。西风吹塞雁,一夜集江潭。”程拳时是湖北人,进士出身,中间两联比之于诗人屈原、宋玉,或竟陵(天门县)文人钟惺、谭元春,用典贴切,对仗严密。作者又娴熟七律体,如居官山东时所作《老卒》《老仆》等雍容富态、不露斧凿痕;在济南任乡试考官时所写《呈马汉冲监试》:

俗吏头衔亦考官,锁闱深处日盘桓。竟言二戴传经好,不信三罗及第难。

鳧鸟朝天飞更远,鸡窗听雨梦犹寒。泱泱东海波澜阔,网得珊瑚且共看。

诗句捕捉形象鲜明,想象绮丽,如颌联与尾联四句。其它像《呈吉渭崖大仆》《赠江明府乙帆》等赠答诗以用典工稳为能事,可以说举不胜举。

珍赏

清雅致莲式玉水盂

□ 胡胜盼

文房清玩是指那些在书案之上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物件,现在也简称“文玩”。水盂也称“水丞”,是“供磨墨用的盛水器,以玉石或陶瓷制成。”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清乾隆莲式玉水盂,作动植物仿生形,清新雅致,巧夺天工。

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水盂辨·晋人水盂》中提及:“古人无水盂,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可见水盂出现时间早于砚滴。清乾隆莲式玉水盂,质地纯洁莹润,雕工精致细巧,器呈一大一小双莲蓬状,一只鹭鸶口中衔鱼伫立一旁,意趣盎然。水盂是从传统的盂类器物中分离出来的专供文房使用的器具,始见于汉魏时期。将水盂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文人相对,体现了文人雅士追求休闲优雅生活的一种景象,既赏心悦目,又展现了文化张力。制作水盂的材质中除了数量最多的陶瓷水盂以外也有水晶、琉璃、玉石、玛瑙、等各类珍贵材质。水盂虽小,但是不仅用料贵重,做工也极其精美,可以很好地体现主人的审美情趣,并且水盂因为小巧可爱便于更换和收藏,所以从古至今都极受文人喜爱。

我国以玉制作文具历史悠久,在汉代即有砚滴、洗等多种样式的玉文具,宋人的笔记中已有使用玉臂搁、玉砚的记载,但目前发现的元代之前的玉文具数量有限,可见当时玉文具的使用范围还不是很大。明清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文士阶层迅速扩大,玉器的市场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加上文

人、官绅中出现了玉器收藏热,仿古玉、玉器皿、玉佩饰和玉文具大量出现,玉文具的品种日益丰富,并出现了很多记载使用玉文具的文献,记述较为详尽的有明人屠隆的《文具雅编》,其中记载的玉文具就有笔格、笔床、笔筒、笔洗、砚台、水注、镇纸、压尺、秘阁等多种。这与文人的玉德观紧密关联。《礼记·聘义》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因此后世文人骚客一直对玉制品青睐有加。玉文具以美玉为材质,施以精湛的雕琢技艺,辅以吉祥高雅的题材,既可作为实用器,又是精致的书案陈设品,寄托了我国古代文人骚客的期许,体现了他们对高尚人格和情操的追求。

司马迁《史记》中记录有孟,说“操一豚蹄酒一孟”,可知当时在大的宴饮之中,斟酒小酌,用的是孟。到了宋代,龙大渊作《古玉图谱》,其中文房用具十式之中便有了孟。飞越千年,小孟从嬉闹喧哗的宴会上走进了宁静清雅的书房,一改盛酒之俗而盛水,专为洗笔滴砚,而且昵称为水中丞。明代学者高濂《高子书斋说》中写道:“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则可以使人舒畅,神气清爽……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密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密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这当中也提到了水盂。此时的水盂终于被名正言顺的列入了文房用具之中。清朝时的名画《弘历古装坐像》中水盂处于显眼的位置,说明水盂也深受皇官贵族喜爱。



清乾隆莲式玉水盂(上海博物馆馆藏)

《华山碑》,全称《汉西岳华山庙碑》,又称《汉熹西岳华山碑》《熹华岳碑》《西岳华镇碑》《华山庙碑》等,简称《华山碑》,是汉隶书成熟时期代表作之一,与《礼器碑》是汉隶碑刻的典范,视为汉隶中的“馆阁”,被清代学者朱彝尊誉为“汉隶第一品”。

《华山碑》刻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原碑立于陕西阴县(今华阴市)西岳庙中,碑高173.5厘米,宽84.7厘米,共22行38字,字径3厘米,额篆书阴文“西岳华山庙碑”2行6字,原碑毁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碑文内容为东汉弘农太守袁逢以前代所立庙碑被毁,乃按经传所载,重新整理碑文,记述周至汉代间历代统治者祭华山的祀典,以及他本人主持修葺西岳庙的经过。后来袁逢迁京兆尹,继任太守孙璆历经四年完成修缮工程,并立此石碑。

《华山碑》在唐代已被重视,当有其拓本,但未流传下来。传世原石旧拓本主要有四种:

一为“长垣本”,也称商丘本,系宋拓,以明代长垣王文恭所藏而得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商丘宋犖得到后携至江南;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归商丘

陈崇本收藏;清嘉庆二年(1797年)成亲王永理购得;约清道光六年(1826年)归诸城(今山东诸城市)刘喜海;清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年至1865年)间,归乐平(今江西乐平市)黄廷祥收藏,后归上元(今江苏南京市)宗源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端方宝华盒。1929年为日本人中村不折所得,今藏于日本东京上野书道博物馆。

一为“华阴本”,也称关中本,系明拓,因明代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肇商、东荫商兄弟所藏而得名。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归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郭崇昌;清顺治元年(1644年)由华州王弘撰收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海黄文莲得于安徽歙县。

汉隶第一品——《华山碑》

□ 张天雁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黄文莲赠予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朱筠;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长乐(今福建福州市长乐区)梁章钜在北京与洋商争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端方宝华盒,后归崇德(今浙江桐乡市)吴乃琛收藏。1959年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一为“四明本”,因曾由宁波(古称四明)天一阁范氏所藏而得名。明清间,经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奉化区)丰照、全祖望和宁波天一阁递藏;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宁波天一阁主人送予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钱大昕之子钱东璧;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仪征(今江苏仪征市)阮元在杭州购得;清咸丰九年(1859年)转归白完颜崇实收藏;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归端方收藏。清末,端方之女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权成婚时用作妆奁,后曾质于济宁(山东济宁市)李汝谦,经潘复、胡惠春递藏。1975年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一为“顺德本”,也称李文田本、小玲珑山馆本,因清末顺德(今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李文田获存而得名。明清间,先后被仁和(今浙江杭州市)金农、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区)马日璐收藏;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归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伍福收藏;清道光元年(1821年)阳城(今山西阳城县)张敦仁在邗上(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购得;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顺德李文田督学江西,从张敦仁后人手中购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文田于北京去世,其子李瀚硕携返广东,后由其孙李棣(李瀚硕之子)继续保存。今藏于香港中文大学。

